

徐悲鸿五次画插图

我国现代著名画家徐悲鸿，一生创作的绘画作品数以千计，他的代表作如《田横五百士》《九方皋》，以及人们所熟知的《奔马》，都是尺幅较大的独立作品。很少有人知道，徐悲鸿也曾生活在困窘时为书刊画过插图。尽管如此，徐悲鸿对待这些插图的态度仍然是非常认真的，这些近百年前的插画，也为我们揭开了徐悲鸿绘画生涯中鲜为人知的一面。

早期在上海、北京为教科书画插图

1915年夏末，徐悲鸿带着介绍信，来商务印书馆找《小说月报》的主编恽铁樵。他见过徐悲鸿后表示，商务出版的教科书需要插图，让徐悲鸿画几张样子看一下。过了两天，徐悲鸿带着画稿上编辑所，恽铁樵看了画稿，对徐悲鸿说，他的人物画得比别人的好，十之七八没有问题，叫他等几天去听回音。然而，徐悲鸿得到的最终意见却是：国文部的三位主持人——庄百俞、蒋维乔和陆伯鸿开会审定徐悲鸿的画，蒋、陆两位通过了，庄百俞不同意，说线条太粗。

打击之下，为了帮助徐悲鸿摆脱经济困境，热心的商务印书馆职员黄警顽找到中华图书馆经理叶九如，建议出版一套《谭腿图说》的体育挂图，还自告奋勇写解说，并推荐徐悲鸿的绘图。黄警顽与徐悲鸿合作完成并



徐悲鸿为英文版《王宝川》所作插图《平贵投军》。

交稿后，叶九如给了三十元稿酬，黄警顽全部转给了徐悲鸿，这是徐悲鸿一生卖画的第一笔巨额收入。

1917年12月，在康有为的建议与支持下，徐悲鸿携蒋碧微赴北京，拟向民国教育部争取官费留学法国的机会。此时，蔡元培、李石曾与北大教授沈尹默、马幼渔、马叔平等，利用庚子赔款的退款创办了一所新型学校——孔德女校（后更名北京孔德学校）。孔德学校比较注重学生能得到全面发展，在李石曾的邀请下，徐悲鸿与蒋碧微都参与了孔德学校的工作。蒋碧微教音乐，徐悲鸿参加学校教务评议会，在为教材改革贡献意见的同时，还给小学一年级学生用的国语课本画插图。随后，徐悲鸿还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

徐悲鸿在等待官费留学机会的同时参加工作，一方面固然有利于积累人脉，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缓解“升斗之忧”的燃眉之急。

留学法国期间为小说画插图

1919年3月，徐悲鸿赴法国开始官费留学。从1921年开始，由民国教育部支付的留学费用时常拖延，有时甚至拖欠达十个月之久，导致徐悲鸿债台高筑。为了维持生活，徐悲鸿在1924年曾经为小说画过插图，他为俄国作家谢尔盖·佩尔斯基所译法文版《韩国故事》（中文版名为《朝鲜民间故事》）所作插图十五幅，其中三幅有款识，五幅钤有自己的印章。

法文版《韩国故事》1925年由巴黎德拉克雷夫书店出版，该书内页封面有用毛笔书写的红色法文书名等字样，其中间部分则是徐悲鸿为该书中第十六个故事《鸟语》所作插图。此书的中文版后来也原样刊载了这十五幅插图。徐悲鸿基于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领悟，在插图中重构故事场景，增添了东方神韵，提升了故事的艺术品质。

在欧洲举办画展途中为好友画插图

为法文版《韩国故事》画插图十年之后，1934年7月，英国伦敦麦勒有限公司出版熊式一所撰英文版《王宝川》，徐悲鸿又为此书

绘制了三幅彩色插图。

《王宝川》一书改编自中国传统剧目《红鬃烈马》。熊式一的《王宝川》将原剧改为四幕话剧，并作了比较大的调整与重新创作，女主角的名字也由“王宝钏”改为“王宝川”（熊式一认为“川”相比于“钏”，对应的英文更朗朗上口，更优雅，更有诗意）。这些修改为《王宝川》带来了活力和新意，王宝川聪明、美丽、机智、富有尊严，与原剧的旧传统女性的典型王宝钏截然不同。最重要的是，熊式一改变了有关薛平贵与西凉代战公主的关系。《王宝川》中，薛平贵在登基前夜，伺机脱身重返祖国，一直没有与代战公主成婚。这一改变，戏剧性地突出了薛平贵的智勇双全和忠贞不贰的美德，也避免了在西方可能引发的批评。该剧出版后不久即搬上舞台，大受观众欢迎，在世界各地进行了演出。

熊式一是徐悲鸿的好友，现代中国杰出的双语作家，毕生除用英文改编中国传统剧目、创作反映中国现实的新剧外，还执教于英、美、新加坡等地，以弘扬中国文化为使命。1934年4月，徐悲鸿由意大利赴莫斯科举办画展，途中为熊式一的《王宝川》绘制了这“三幅半”插图。其中三幅为彩色，而《探寒窑》未及上色。剧本出版时，刊印了其中三幅彩画作插图，少数限量版中则用了所有的四幅画。

现有三件设色作品均有“悲鸿”落款，均钤同一白文方印“徐悲鸿”。第一幅插图从情节看应为“抛绣球”。整个画面拥挤但不局促，富有节奏；用笔极为松活、流畅，变化多姿又能紧扣造型；设色整体给人润透的春意盎然之感。

第二幅插图题为横幅，内容应是薛平贵投军。画面中，薛平贵纵马向右疾驰，与身后的城墙呈渐行渐远的开张之势。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华天雪认为，该作有两点最值得注意。其一，徐悲鸿画马通常只画马，很少画带关系的人和马，像这样疾驰状态中的人马关系，像这样关联状态中的准确造型，都是徐悲鸿作品中极少见的。其二，这匹侧身奔跑的黑色坐骑，精细程度也为徐悲鸿



《朝鲜民间故事》中徐悲鸿所作插图。

画马中所仅见，很少有像这样从笼头、缰绳、铃铛到马鞍、马镫，装配得如此齐全且刻画得如此工致的；徐悲鸿的马鬃、马尾大多以大笔扫出，很少像这样以线为主的。这四匹马堪称徐悲鸿画马范本，而且是水平很高的范本。

第三幅插图《赏雪》，亦被用于封面。画面中央，“王允坐在相府花园内的石桌边品茗赏雪，周围是翠竹、芭蕉、湖石”，但似乎“雪”意并不明显，设色倒更似春天。与前两幅不同，此图情节较为平淡，人物性格特征也不突出，因此，徐悲鸿着力于营造丰富的背景环境，所动用的笔墨方法也更为多样，更接近传统中国画的样式。成片的竹林、多姿的芭蕉、粗笔写意的湖石和白描的桌凳，在徐悲鸿画作中，这种表现古代士人优游生活的主题极为罕见。

1933年至1934年的系列欧洲画展，奠定了徐悲鸿作为中国现代绘画大师的国际声誉，是他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徐悲鸿为英文版《王宝川》绘制的这批插画，则是他历次插图绘制生涯中，唯一一次不必面对严峻的经济压力且在心情十分舒畅的情境下所产生的作品。这些插画之所以具有上述诸多可圈可点的独特艺术价值，应该说与徐悲鸿的心境有很大关系，这也是艺术的奇妙有趣之处。

本报综合消息

矢志来华 以专业天文学知识立足北京

1592年，汤若望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科隆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贵族家庭。少年时代曾就读于名校罗马的日耳曼学院，毕业后进入罗马学院深造，并于1611年加入了耶稣会。当时，汤若望对于法籍耶稣会士金尼阁带回的关于东方的信息深感兴趣，于是下定决心要赴中国传教。1616年初，汤若望向教会递交了自己前往中国传教的申请。起初，汤若望直属教会院长认为其尚未完成学业，拒绝批准。直到1617年10月，汤若望毕业，他才得以跟随金尼阁前往中国。汤若望一行人从里斯本登上了“善心耶稣”号轮船，在经过艰苦的海上航行后，于1619年7月15日抵达中国澳门。

由于1616年南京发生教案导致传教士被驱逐，汤若望等人在中国内地几乎无立足之地。1620年，天主教徒徐光启奉旨训练新兵，防御都城，他派遣自己的学生张燾、孙学诗赴澳门购买火炮来装备明军，并以欧洲的方法来训练明军，抵御后金在辽东的强大攻势。另外，徐光启也计划借此机会，“夹带”一些传教士入京。在徐光启的关照下，汤若望得以顶着火炮专家的身份北上进京。不过，真正让汤若望在北京站住脚的，是他所具备的专业天文学知识。1623年10月8日，汤若望准确预测了日食的时间，使其在北京声名鹊起，其精通天文学的优势得以彰显。1627年，汤若望被派往西安接替金尼阁的工作，对中国社会有了更深层的了解。就在同年，明熹宗天启帝驾崩，崇祯帝继位，徐光启升为礼部侍郎。在徐光启的游说下，明朝对天主教的政策出现松动。1629年，徐光启向朝廷奏请改历法，得到崇祯帝的批准，徐光启得以邀请传教士邓玉函、龙华民进入钦天监。1630年邓玉函因病去世后，汤若望和意大利传教士罗雅各被召回北京承担邓玉函的工作。

崇祯帝赐“钦褒天学”牌匾 还命其制造西洋火炮

自元朝以来，统治者一直引用阿拉伯历法来修正中国原有的历法，但阿拉伯历法因时代已久，多次出现实际天象与预报不合的情况。汤若望等人则将西方天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与中国传统历法相结合，编纂完成一部相对准确的历法——《崇祯历书》，但由于保守派的阻挠和战争频发，使得这部新历法



未能推广。尽管如此，崇祯帝依然嘉奖汤若望，赐给其刻有“钦褒天学”的牌匾，以此肯定汤若望所做的贡献。

身为传教士，却从事着科学家的工作，这使得汤若望遭受到部分天主教人士的强烈批评。此外，他在钦天监工作时，会顺应中国传统，在历书的每日之下记“宜”与“忌”，这些都使得他遭到许多教会同行的质疑。然而，汤若望却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在他这一切工作上所怀的最后目的，就是要借这一切工作为传教的工作谋便利”。在负责改革历法之余，汤若望还受命制造西洋火炮，不可思议的是，他仅凭书本知识就成功地造出了20尊大炮，崇祯帝“嘉其坚利，诏再铸五百位”。1643年，他又奉命计划建筑北京堡垒图样。1644年，汤若望还奉命赴北方考查防务。

今天的北京市委党校院内，坐落着一处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的墓群，其中，在一处墓主名为汤若望的墓碑上，镌刻着“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的字样，这是清朝康熙皇帝为其题写的赞词。汤若望是谁？为什么他会得到康熙皇帝如此高的赞誉？

汤若望何以得到明清皇帝赞誉

建北京城内首座大教堂 并引入西方科学知识

清军进入北京后，因汤若望又准确地预测了本年九月一日将发生日食的现象，汤若望因此又获得清廷认可。在摄政王多尔衮的关照下，他在北京宣武门内的住所不仅免于搬迁之苦，他还得到摄政王多尔衮的重用，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汤若望按照西洋新法修订完成却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的《崇祯历书》，则被清廷重新定名为《时宪历》。

1650年，清廷赐予其土地，于宣武门内原天主堂处重建教堂。汤若望由此建成了北京城内首座大教堂，该地也成为他和其他来华神父的住宅。

多尔衮死后，13岁的顺治帝亲政。由于汤若望曾经对多尔衮的专权表露不满，又曾为顺治帝预测过多尔衮将命不久矣，于是汤若望又得到年轻君主的赏识。顺治帝视汤若望为自己可信赖的长辈，尊称其为“玛法”，也就是满语中“祖父”的意思。顺治帝对汤若望信任到什么程度呢？他允许钦天监的一切奏折，在任何时间，无论皇帝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亲自呈交到皇帝手上。顺治还免除了汤若望三跪九叩之礼，而这种待遇在整个朝中只有两位大学士和四位都臣可以享受。此外，顺治帝还赐准独身的汤若望承继养子，赐准他随意转赠御赐的礼品。汤若望先后被授予太仆寺卿、太常寺卿、通政使等职，并获得“通玄教师”的尊号。1658年封为“光禄大夫”，赐给一品顶戴，并旌其祖先。顺治帝在处理政务的百忙之中，还常造访汤若望在宣武门教堂的家，一边欣赏把玩汤若望房间内的科学仪器和艺术品，一边闲谈，到深夜也不觉之累。

由于汤若望在宫廷里的显赫地位，地方上的传教士大多免于被官府为难。此外，汤若

望还在清初编纂了大量的科学著作，将西方科学，包括天文、历算、光学、物理、解剖学、血液、地震等知识介绍给中国人，为中西科技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1666年病故于北京 被葬在利玛窦墓旁

1661年，顺治帝驾崩，年幼的康熙帝继位。此时汤若望的处境却越发凶险。一方面，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传教士进入北京后，嫉妒汤若望在宫廷中的显赫地位，于是在教皇面前攻击汤若望只知传授西方科技，而忘却传教事业，从而逐渐被中国人同化，汤若望因此受到马尼拉大主教以及罗马教皇的叱责。另一方面，杨光先等清廷保守势力在鳌拜等辅政大臣暗中支持下，发起对汤若望及其背后顺治帝政治遗产的清算。

面对内外夹击，备受中风瘫痪折磨的汤若望无法言语，只能通过助手南怀仁来回应各方诘难，但已力不从心。1664年，保守派的后台鳌拜下令废除新历法，并逮捕了汤若望和他在钦天监的下属，汤若望被判凌迟处死。后来，经孝庄太后干预汤若望才被赦免，留住北京，但被禁止回到之前的住所，至于陷害汤若望的杨光先则因此走上了钦天监监正之位。1666年，汤若望病故于北京，时年75岁，他被葬在了利玛窦的墓旁。三年后，已经亲政的康熙帝在汤若望的助手南怀仁的请求下重新审理此案，罢黜了杨光先等人，为汤若望平反，恢复其生前一切荣誉并给以隆重的安葬。

汤若望终其一生以传教士自居，却没有在传教上有所建树，反而是以科学家的身份受到中国人的尊敬。在汤若望的身后，南怀仁、白晋等传教士继续为康熙帝介绍引入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开阔了这位“千古一帝”的眼界。

本报综合消息